红杏何以污名化

——探究宋代的红杏意象转型

房效民（2023313409，13500710553@163.com）

**摘要：**杏花作为中国的传统花卉，很早便作为咏物的意象出现在文人的诗作中。到了唐代，杏花诗出现了普遍繁荣。当时的杏花更多是作为春天的意象以及青春美好的少女形象，到了宋代，地位却持续走低，成为俗艳薄幸的代表。本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及宋代文人的思想转型，得出杏花在宋代地位持续的走低，主要是宋代文人在思想上更关注伦理道德以及比徳思想的兴起共同作用的。

**关键词：**杏花，宋代，比徳思想，意象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杏花作为中国的传统花卉，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吟咏花卉的咏物名篇更是不胜枚举。但是长期以来在咏物作品中出现较多的一般是梅兰松菊这类高雅意象，通常文人不仅仅局限于对花卉的外形做简单的摹写，而是在花卉中倾入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思想。随着理学复兴，这种思想在宋代达到顶峰，它们脱离了物像本身，而是更多地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象征。中国文学中的花卉意象已经与中国文人的品格修养之间建立了“异质同构的关系。【5】

与以上四花相反，杏花逐渐被视为一种薄幸之花，成为俗艳一词的代表，因此其研究文献也不多。在唐代与之在咏物诗同地位的梅花在宋代成为了群芳之首，而杏花却被逐渐污名化。因此关于宋代杏花为何逐渐被污名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已有研究文献更多关注于杏花的文学意象以及文学内涵，对于宋代的意象转型，更多只是简单提及但没有深入其原因，并无直接相关文章研究。笔者认为，关于杏花意象污名化的研究可以管中窥豹看出宋代文人相比前代在思想意识上的转变，可以对这相关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2文献综述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情况和文献资料来看，对于杏花的文学以及意象研究并不多，且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对笔者撰写本文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何小颜先生的《花与中国文化》运用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和神话传说，探讨了花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对研究花卉文化的学者而言，极具参考价值。该著第二章《杏花消息雨声中》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杏花及其相关意象，

如，杏花的外在特征、杏花和雨的关系以及杏坛和杏林的来源等；第四章之《有杏不须梅》，借一则明代故事，从“杏”与“幸”谐音双关的角度着手，列举了各类代表吉祥如意的花卉。但该著对宋人咏杏之作的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关于杏花的文学意象发展的研究，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应该是南京师范大学丁小兵的《杏花意象的文学研究》。该文分析了从先秦到金元时期的杏花文学，对杏花的审美形象和艺术表现进行了解读，同时，还对杏花经典意象和代表作家做了重点分析，对于杏花的意象转型原因，文中认为是宋时理学复兴与儒家思想兴盛，但没有对这一成因做具体的解释，本文打算深入探究其原因。唐铭君的《宋代咏杏诗词研究》主要研究了杏花的三种自然姿态的文学创作以及以杏花为主的连缀文学意象，文中也提及关于杏花由于宋人比德思想而地位逐渐降低，但是并没有分析具体原因。

其他期刊资料：崔建楠《探究中国文学中的杏花意象》更侧重于杏花背后的人文因素，如与医，儒，仙隐等。张痘《满园春色关不住--唐诗中的杏花意象》主要探讨唐代杏花诗特点及成因。事实上，杏花污名化从唐时就有踪迹，因此一味地说宋代理学对杏花污名化的影响可能片面。程杰《论中国文学中的杏花意象》一文，从中国文学角度着手，对诗歌中的杏花意象做了纵向分析，其内容涉及杏花的物色美感、节令情韵和文化意蕴等。福建教育学院赖丽青《唐宋时期杏花意象的发展衍变管窥——唐宋诗歌杏花意象比较》一文，从杏花的美感特征和情思意蕴角度，对唐宋两朝杏意象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对比研究。

二．杏花题材和杏花意象诗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2.1唐以前杏花文学的产生及发展

杏花作为一种花卉 早已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杏是我国栽培最早的果树之一，在我国的栽培历史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即有杏字。《管子》《礼则》《山海经》等都提到了杏，涉及其分布，种植和利用。早在西周时代，据有关文献记载 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开始培育草木了。《夏小正》有：“正月梅、杏、 桃始华。”这里说的是梅杏、桃三者的开花顺序 但已表明了杏花的存在。同时在稍后出现的《诗经》、《楚辞》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出现有关杏花的记载 但从“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扌票有梅 其实七兮”（《召南·扌票有梅》）、“何彼矣？华如桃李”（《召南·何彼 矣》）这些诗句中可以肯定杏的存在。有关杏花物候性质的描写还有西汉《汜胜之书》：“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此时关注的仍是杏花的农耕作用，通常不视为文学作品。

以上论述已经证实了杏花在我国是早就存在的，存在通常就会带来人们对它的文学描写。对于桃李梅杏这样结果子的花，人们最早关注的通常是其实用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更加关注自然山水，因而自然界的花卉也自然而然成为文人们创作的对象。西晋潘岳《闲居赋》：“竹木蓊郁，灵果参差。......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及也。”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庾信的那首《杏花》：“春色方盈野 枝枝绽翠英。

依稀映红坞 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 金盘衬红琼。”这是文学史上专咏杏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杏花作为咏物题材正式出现。

2.2唐时的杏花文学

到了唐代，诗歌进入繁荣期，咏物诗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杏花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伴随着整个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尤其是写景、咏物题材的兴起，杏花较前代的那种简单描摹出现了明显的改观，不管是在专篇吟咏上，还是在意象寄托上都大为增加。根据对《四库全书》集部唐代别集、《全唐诗》《全唐五代词指向杏花村》等进行粗略的统计，唐诗中的咏杏和以杏花意象为主的诗歌有60首。

总体上来看，较前代咏杏文学的状况，唐五代时期咏杏文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创作类型上，唐代杏花诗也有很大的突破。首先是直接描摹物象。唐代诗人吴融《杏花》：“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红轻欲愁杀，粉薄似啼销。愿作南华蝶，翩翩绕此条。”这首诗点出了在春天的大地上，万物竞相争妍斗巧的时候，杏花的娇嫩是最突出的，所以才会惹来万物的忌妒，惹得蝶儿也久久不愿离去。而司空图《村西杏花》中的“肌细分红脉，香浓破紫苞”两句写出了杏花肌肤的光滑细腻，甚至能够看出叶子表面的脉纹，而杏花的浓香竟然穿透花苞散发出来。其次，由于于在唐代科举考试放榜的时间与杏花开放的时间重合，因此杏花与科举考试联系到了一起。杏花也因此被称为“ 及第花”，寄托了诗人们金榜题名的愿望。 郑谷 《曲江红杏》中 “ 女郎折得殷勤看 道是春风及第花”通过女郎之口表达了诗人希望科举高中的愿望。 黄滔《放榜日》中“岁岁人人来不得 曲江烟水杏园花”。

三． 宋代的红杏意象转型

3．1 宋代杏花诗的繁荣与红杏地位的持续走低

杏花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宋代达到鼎盛，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不仅是杏花，

其他花卉文学也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杏花文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之前大为提高。通过检索工具对《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文本进行粗略统计，其中描写杏花或者与杏有关的意象的诗共有104首，词21首，文一篇。其中提及杏的单句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相比唐时，这一时期的咏杏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单个作家作品数量的激增 宋代咏杏大家有王禹偶、 王安石、 杨万里等 虽然他们的咏杏之作并没有呈迅速递增之势，但他们都有咏杏组诗出现，并且开始从多方面去描写杏花。专题吟咏1首，可以说杏花在王安石的笔下是描写得最为生动的。 至于杨万里 他的一生都热爱花花草草，他有《雨里问讯张定史通判西园杏花二首》、 《郡圃杏花》二首、《行阀养种园千叶杏花》两首，再加上其他单篇描写杏花的作品，共计咏杏作品 16 首，他也是宋时杏花着力最多的一位大诗人。其他如梅尧臣、苏轼、司马光,范成大、陆游等宋代文坛的巨匠,他们也有一些提咏杏花的作品，也各具特色。

宋咏物诗相比唐时最大的转变就在于宋人受儒家义理和理学思想影响更甚，道德意识普遍高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强烈的比德倾向。“古人认为花品是有高下之别的 是由天地所赋不可轻视的。”[1]但是，人们都知道花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等级之分，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可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潜意识的深处并不把花卉当作外在的自然物看待，而是视同与自己一般无二的有生命的活物。莲花在周敦颐手中成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象征，梅成为“岁寒三友”“群芳之首”，而与之同地位的杏花却成了污名化的代表，被视为一种薄幸之花 在它身上，文人没有赋予高尚的道德象征，相反它的多变的颜色、 妖绕的风姿变为文人贬低杏花的证据。 因为它的开时浓艳又易凋零的生物属性使得士人们在杏花身上找不到“比德” 的因素，就使得它不能作为那种美好品质、 坚贞气节的象征。相反，缘于比德意识在宋代的高涨，更促成了杏花审美向相反方向发展。

3.2比徳思想的兴起以及花卉的道德形象

关于比徳思想的兴起，就不得不提孔子，虽然说比徳思想并不是从孔子开始才有的，但是他却是公认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比徳思想的倡导者。所谓的儒家的比徳模式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其典型的代表就是《论语雍也》中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以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最能代表儒家的比徳模式。“比”是指象征，比拟的修辞手法，而德通常是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德，它传达出的观念就是自然界的某些物象所呈现出来的物像之美可以体现出某种人格之美。根据儒家的比徳模式，物像的美体现在它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性，而不由它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决定。因此，比徳模式其实也是一个将道德品质客观化，而将审美主观化的过程。

由于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兴起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复兴，比徳思想开始逐渐在文人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郑思肖的《画菊》，不与百花为伍的菊花，即使在枝头枯萎也不会因为北风凌烈而被吹落，赋予菊花至死不渝，不趋炎附势的高尚情操。再比如有诗人陆游对梅花的高度评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高度赞扬了梅花逆境中不屈不挠，高尚的志节和操守。随着比徳思想的日渐兴盛，梅兰竹菊逐渐成为高雅人格的代言，而桃李杏海棠逐渐被视为凡俗之品。桃花更倾向于被用“妖”“浮”来形容，李被认为寒酸粗陋，而对于杏的贬抑主要体现在一个俗上。【2】姚宽在《西溪丛语》一书中对杏花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他说“予长兄伯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夭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可见当时杏花给人的感觉是妖艳的。杏花的生物属性就是开花时浓艳，花色多变，并且极易凋零，因此很难在杏花身上寄托文人对于高雅品性的追求，相反，杏花红颜薄命的特性与风月场所的青楼女子有了一致性，因而根据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她们的行为必然是羞耻的，被人们所轻视的，最终形成了定势，使得杏花从唐代作为青春少女的象征转变为俗艳，薄幸的代表。

“异质同构”学说认为，人并不是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外物的身上，而是外物的运动和形状本身就是一种表现，表现某种人的情感。这种说法不完全对，确实我们承认，当外物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与我们的一些道德审美相符合时，我们会认为这些外物会表现出来某种道德品质，但这其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审美倾向的来源，这种说法认为我们的审美倾向来源于客观事物，其实是不对的，它忽视了审美的主观能动性。[3]普列汉诺夫指出：“美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对于花卉来说，其实无所谓品格的高低贵贱，只是其表现出来的生物属性使人们产生了对道德品格的联想和想象。“比徳”的核心：【4】自然的道德人格化和伦理化，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强调了比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一下宋代文人在思想意识上相比前代的转变，相比之前士大夫贵族追求“清淡，不理世事”等传统的处世方法，宋代文人更积极追求参与时事政治，同时也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宋代文人不似唐人那样张扬、奔放，更加倾向理智和稳健，面对时局变换、人生百态，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苏轼被贬往海南，也不自甘堕落，而是吟诗作文，苦中作乐，在暮年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而由于理学的兴起以及道德意识高涨，宋人相比前人更加在乎礼义名节，对于身边所植树木花草，不仅追求其物色欣赏，更在其中体现了胸襟情怀。宋人的审美情趣处处体现着通过物色表象追求道德境界到最后抒发品格意趣的色，通过对植物的吟咏来体现自己的高尚情操。

所以对于红杏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在宋代地位持续的走低，是因为宋代儒学复兴，伦理道德意识兴起，比徳思想高涨而引起的对红杏的自身品性定位的重新认定。其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宋代士大夫思想上的转变。

四．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分析杏花诗一直到宋代，杏花地位持续走低的发展历程，结合宋代历史条件，分析并得出了红杏污名化的产生原因。全文在分析杏花地位下降的同时也揭示了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转变，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借鉴本文的研究思路对其他花卉展开研究分析。本文关注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方法也为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丁小兵.论古典文学中杏花的审美意象[J].菏泽学院学报,2005,(01):51-54.DOI:10.16393/j.cnki.37-1436/z.2005.01.014.

[3]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

[4] 吴秋煊.试论"比德"的形式特征和思想内涵[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

[5]俞香顺.中国荷文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5-05-30].

[6]赖丽青.唐宋时期杏花意象的发展衍变管窥——唐宋诗歌杏花意象比较[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8,19(12):12-15.

[7]陈翔,杨旺生.论宋代杏花文学的发展[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32(03):131-134.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3.038.

[8]程杰.论中国文学中的杏花意象[J].江海学刊,2009,(01):187-195.

[9]丁小兵.杏花意象的文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5. 请随文提交三个证据来源，即选择文章中出现的三个证据（如引用基本文献、引文他人观点等），用截图形式给出证据真实来源。如下所示：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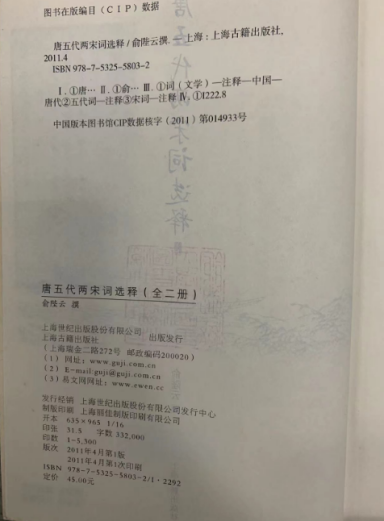
五代南唐冯延巳词名甚著，曾被誉为“五代词中之圣”[1](P88)“与温韦相伯仲也”[2](P8)，有《阳春集》传世。然而谈及其具体词作，后代词家多以“谬悠其辞，若显若晦”[3](P188)“幽咽惝恍，如醉如迷”[4]（P4）字眼来概述，历来对其深意也多有歧说。词家之所以认为冯词难以把握，不在于字词的歧义，而在于其本事的难以确指。正如俞陛云所言：“冯词未能证实，殆寄托之辞。”[1](P84)虽其本事“未能证实”，但观其人生际遇之种种情状，则其情怀所寄略可窥见，与南唐中主李璟之“旧游”或可提供窥视其寄托的途径，并可由此拓展我们对早期词作交际功能的认知。先从一篇学界少有人关注的碑记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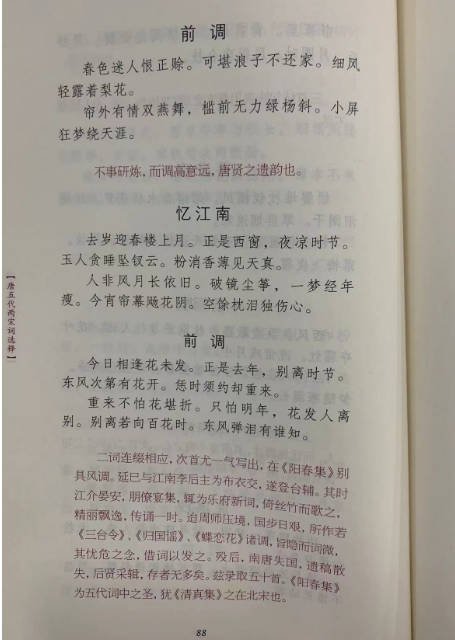
证据来源说明：

引用一：

曾被誉为“五代词中之圣”[1](P88)

[1]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引用二：“与温韦相伯仲也”[2](P8)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